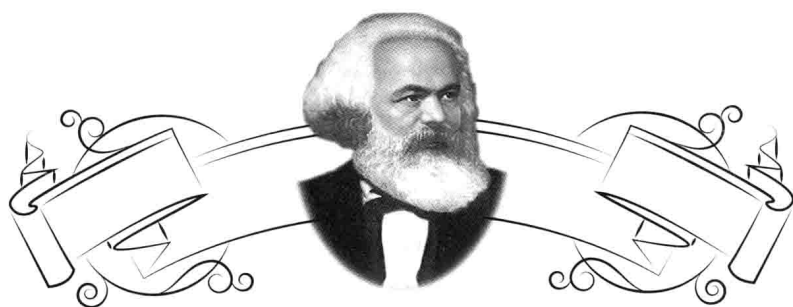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初始形态研究

王刚 著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初始形态研究

王刚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宰艳红
责任校对：杜凤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研究 / 王刚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01-014162-6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0608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研究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DE CHUSHIXINGTAI YANJIU

王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290 千字

ISBN 978-7-01-014162-6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言

朱熹曾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意思是说，只有弄清事物的本、源，才能理解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说，也只有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源问题，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究竟继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进而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王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研究》就是一部从源头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著。从源头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域，弥补当前学术界对此项研究的不足，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明确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理解“三个自信”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进而增强“三个自信”。

本书是王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研究系列丛书的第二部（第一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已由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出版，该书着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中国化的过程），作者着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早期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作者还将推出该系列研究的第三部，准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早期结合的载体（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早期的“过程”“结果”和“载体”这三个方面“本”“源”问题的研究，系统阐释和回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及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本书把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这一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研究的时间节点。从梳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形态入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进行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和政策形态及其基本特征，进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关联性。

本书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视角独特。形态学最早是研究动植物形态的科学，其目的是描述生物的形态和规律。在现当代，形态学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各领域，形成了哲学形态学、语言形态学、历史形态学、社会形态学等。本书从形态学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早期所形成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政策形态，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乃至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学作出了初步的探索。

二是历史感强。本书研究的着重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不是空中楼阁，也不可能凭空产生，有其前提和基础。作者系统梳理了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次生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形态，并进一步回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需要解决的“何以需要”“何以可能”与“如何实现”三个前提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过渡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政策形态。形成了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这一清晰的历史演进脉络。除此之外，本书的历史感强还体现在作者扎实的史料、文献收集功夫上。翻阅本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为论证书中的每一个观点，都收集了详细的文献和史料。

三是问题意识强。作者在书中提出并深入思考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重要问题，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亟待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比如，作为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和政策形态的基本内容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何以需要”“何以可能”与“如何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政策形态的基本内容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是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

形态在当代是如何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政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无疑对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注重现实关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的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种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政策形态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创新发展。

总之，这是一部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一定开拓性作用的著作。本书的阶段性成果已有4篇论文在《人民日报》理论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理论视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核心期刊上发表。

当然，该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的探索性研究成果，一定还存在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希望该书出版后能得到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作为王刚的博士后学术联系导师，每每看到他的进步，甚感欣慰！在他的新著出版之际，写了以上文字，是为序。

王 跃

2014年10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前 言

形态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事物的状态或表现形式”^①，《辞海》解释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②。如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过去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③，其中的形态，就是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过去的宗派”在当时的表现形式。二是“语言学中指词的内部变化形式”^④，即词与词组合时，词的形式上发生的变化。本书的形态特指第一层含义，即事物的状态或表现形式。由此可见，事物的形态是由事物的“状态”来表现的。那么，什么是事物的“状态”呢？“状态”是指“人或事物表现出来的形态”^⑤，如固体状态、心理状态、清醒状态等。就人而言，不论是睡眠状态还是清醒状态，其主体实质上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外在表现形态不同而已。但睡眠状态只能与清醒状态相比较，工作状态也只能与休息状态相比较。这就是说，当我们谈论一个事物的不同状态时，必须确定其划分标准。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同一事物就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状态来。如前所述，如果以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为划分标准，就可以分为工作（学习）状态、休息状态等。

① 《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1 年修订第 3 版，第 1100 页。

②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29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40 页。

④ 《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1 年修订第 3 版，第 1100 页。

⑤ 《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1 年修订第 3 版，第 1303 页。

由此可以看出,划分事物形态的标准非常重要。怎样确定划分事物形态的标准呢?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划分事物形态的标准必须是外在的,而不能以事物内部某个构成要素作为划分标准。例如,实践的主体是实践内在的一个构成要素,如果以这一要素来划分,实践包括个人实践、集体实践和人类实践,这不是实践的形态,而只能是实践的三种不同形式^①。所谓的外在标准,就是事物构成要素以外的东西,比如按照人所做事情的不同来划分,他所做的事情就不是他作为人的构成要素,从而成为划分形态的标准之一。

一、研究缘由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②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党和国家赋予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十七大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战略任务,足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性。仅以理论研究为例,据笔者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1983年至2005年,在国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题目中直接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字样的论文有807篇;而200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设立后,特别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后至今,这样的论文有5643篇。

二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至今已有110多年的历史,这一历程充满着艰辛和曲折。如果以当下的视域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细小的差异时,我们会强烈感受到,初始形态细小的差异有时会

① 余国辉:《论实践形式与形态之分及实践形态演进》,《社科纵横》2010年第3期。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28页。

在未来的实际运用中显示出极大的不同，如同混沌学中的“蝴蝶效应”。从源头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域，弥补当前学术界对此项研究的不足，而且对推动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一定的历史论证、历史经验和历史启迪作用。

三是可以增强对“三个自信”的历史认知。党的十八大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①。那么，“三个自信”的底气何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的研究，可以明确“三个自信”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理解“三个自信”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进而增强“三个自信”。以道路自信为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的实践形态的研究，可以回答：“毛泽东道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如何依次递进并构成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整体，进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规律性，形成道路自信。

四是澄清一个误解。在通常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结果，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如党的十七大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成果”是特指理论成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②。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仅仅局限于理论成果，那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表现为三种形态：实践形态的成果、理论形态的成果和制度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制度形态的成果表现为一定的政策和策略）的成果。

二、形态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形态学的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新的研究视域。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② 阎树群：《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形态学最早是研究动植物形态的科学，其目的是描述生物的形态和规律性。在现当代，形态学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形成了哲学形态学、语言形态学、文艺形态学、历史形态学、社会形态学等。从形态学的视域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其目的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早期所产生成果的表现形式，分析初始形态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征，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乃至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从形态学的视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将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片新天地”^①。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概念和研究范围的界定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中国历史和文化结合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这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②其中“解决中国问题”，一方面是指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即“如何做”，这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另一方面也指在具体实践中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和策略，即“怎么应用”，也就是采取怎样的方案、对策、措施，这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策形态。而“创造些新的东西”，则指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即“理论成果是什么”，这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这说明，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要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而且

^① 邓剑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探析》，《江汉论坛》2011年第1期。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还要将马克思主义植入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使之“新鲜活泼”和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进而改造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过程所取得的成就，需要以一定的形式来表现，这种表现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它是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政策形态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分为许多不同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形态。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何时呢？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开始算起，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改造中国的工具来到中国的，从传入肇始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如何一成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②；许全兴教授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时，实际上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③；叶险明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④因此，可以说，随着19世纪末（1899年）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开始了。然而，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那时并不是真正自觉地‘中国化’，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标准、科学”^⑤，即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很低。到了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由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党，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一定的历史主体（中国共产党及广大人民），初步明确了“化什么”（中国社会）、“怎样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化”的成果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具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

② 何一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 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④ 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⑤ 何一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件,从而开始了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重点的阶段^①。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么,它的下限呢?这要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什么它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的下限?美国学者斯蒂文·小约翰认为,“任何一种对经验做出解释和阐述的尝试就是理论,即一种关于某些事件是怎么产生的思想。”^②基于这种认识,本书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何以及怎样“化”的理论,学界有论者把它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③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一个理论是否形成,主要是看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否形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来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中国化,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末(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本形成。那么,六届六中全会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标志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的下限呢?其原因主要有: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范式正式确立,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其中的中国实际是指“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文化”,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充分的

① 张远新、张正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新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马乙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理论辨析》,《南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② [美] 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③ 陈锡喜:《“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以实践需要和特殊性为视角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上海改革发展研讨会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曹泳鑫,吴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与构建范式》,《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汪信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6期。

论证，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如何实现”的问题。三是承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主体真正形成。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在动员全党的力量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使承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主体，无论从人员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是以前任何时候所没有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动员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更加“自觉地、主动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①。四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的明确目标要求，即“化”中国。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这就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中，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的各项条件具备，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奠定了基础。政治上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共产党在当时都是合法的；经济上有一定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文化上新启蒙运动及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为这一任务的提出准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浓厚的思想氛围；国际上共产国际七大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改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六是当时党的高层领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意见基本一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后，不仅张闻天、陈云、张浩等党的领导人赞同，就是当时延安的理论界也积极响应，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且在此后党的七大上对“化”的成效还进行了总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这在以前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③。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中的“早期”就可以界定为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这一时期。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使用的“初始”与“早期”“初期”是相同的。

应该说，把1921年至1938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学界

① 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③ 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也有类似的观点。有的学者就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视角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①,其中第一阶段,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即以1919年李大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为起点,到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为止点的这样一个阶段。”^②该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起点定为1919年,目的是强调要对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思想的重视和研究。此外,黄少群、匡胜、张驰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研究——从中共创建到党的七大》一书中,就把1921年党的创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起点,但其终点则是1945年党的七大。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国内研究看,近年来,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科学发展观形态等研究的逐渐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并相继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各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为进一步深化这一问题研究乃至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也非常明显,其最大的分歧不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没有形态,而在于有哪些形态?为什么有这些形态?围绕这一问题,学界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

一是“一形态”说。持“一形态”说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种主要形态,但这个具体形态是什么,学者之间分歧很大。宋德孝、闫方洁认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同阶段马克思

^① 这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即从1919年李大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到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第二阶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及其延伸阶段,即从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到1978年。第三阶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阶段,即从1978年到现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阶段。参见张世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分期理论与实践研究》,《新视野》2011年第6期。

^② 张世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分期理论与实践研究》,《新视野》2011年第6期。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它们一方面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同时又具有各自独特的理论内容和表述方式,实现了理论的不不断提升^①;王浩斌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②;张艳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形态是一个多维系统,制度化的成果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③;马淑娟、杨永志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实践传统上的融合过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形态^④。应该说,尽管上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种主要的形态,但多数学者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其他次要形态的存在。

二是“二形态”说。持“二形态”说观点的学者较多。杨谦、郭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实践过程,而且也是将马克思主义植入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现代化改造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取得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⑤;阎树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即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从实践层面看,就是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条正确道路;从理论层面看,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科学理论^⑥;林默彪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

① 宋德孝、闫方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形态演进的辩证法》,《前沿》2011年第17期。

② 王浩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及其发展逻辑》,《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③ 张艳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制度形态》,《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④ 马淑娟、杨永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形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⑤ 杨谦、郭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整体性审视》,《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⑥ 阎树群:《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际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同时还集中地体现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①;刘长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整体形态和层级形态之分。整体形态起统帅和导向作用,层级形态起支撑和质料作用,两者都通过理论体征和实践体征表现出来^②;周全华从“理论形态论与学术范式论”的视角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划分为“理论形态”和“学术形态”^③;林默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出发,认为实践理论形态和学术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种基本形态^④。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形态说”,比较好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但没有揭示出实践层面的政策形态。

三是“三形态”说。李君如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学说、运动(实践)、制度三种实现形态,即实践(道路)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⑤;邓剑秋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种有机结合的形态:思想形态、理论形态、应用形态,他在“应用形态”中论述了政策形态的有关内容^⑥;赖大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可以分为原典性“译介话语”形态、“领袖话语”形态、“学术话语”形态^⑦;宋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三个不同的阶段:萌发阶段(1919—1921)、形成阶段(1921—1938)和发展阶段(1938至今),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不同的具体形态^⑧。在“三形态”说中,李君如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比较好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种形态,这对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研究有重要的

① 林默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5期。

② 刘长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形态和层级形态》,《理论探索》2009年第6期。

③ 周全华:《理论形态论与学术范式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④ 林默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态的诠释与建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

⑤ 李君如:《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北京日报》2012年10月8日。

⑥ 邓剑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探析》,《江汉论坛》2011年第1期。

⑦ 赖大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观念到理论形态》,《江汉论坛》2008年第7期。

⑧ 宋一:《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维形态》,《世界桥》2008年第6期。

意义，也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①相契合。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来说，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还处在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还不具备选择和设计制度的条件，因而，当时只能制定各种政策和策略，而当这些政策经过中国革命检验有效后，其中的一部分政策就转变为革命成功后的各项制度。

四是“四形态”说。陈世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为研究视角，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特征通过四种特殊形态表现出来，即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次生形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再生形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②。“四形态”说主要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态来说的，但其提出的原生态、次生态以及再生形态对本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五是“多形态”说。韩海涛、刘长军两位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多种形态，即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历时形态和现时形态、整体形态和层级形态等^③。“多形态”说从宏观层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不同的划分标准及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的形态，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的研究提供了多维的视角。

就本书涉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问题，学界涉及不多。在上述研究成果中，周全华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概括为两个理论形态：理论哲学形态（以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为代表）和实践哲学形态（以毛泽东为代表）^④；赖宏认为，中国共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页。

② 陈世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四种形态及其相互关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③ 韩海涛、刘长军：《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样形态》，《理论学刊》2000年第10期。

④ 周全华：《理论形态论与学术范式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